

思想政治工作的 历史·经验·新要求

本书编写组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思想政治工作的

历史

经验

新要求

本书编写组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新要求/本书编写组编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6

ISBN 7-205-04791-9

I. 思… II. 本… III.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国
IV. 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667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64 千字 印张: 7½

印数: 1—7,000 册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中男

责任校对: 王芳芳

刘 杨

刘艳辉

封面设计: 杨 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9.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过程	1
第一节 创立时期（1917年—1937年）	1
第二节 大发展时期（1937年—1949年）	10
第三节 继承创新时期（1949年—1966年）	19
第四节 曲折时期（1966年—1978年）	31
第五节 新的探索时期（1978年—1999年）	34
第二部分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	51
第一节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51
第二节 紧紧围绕革命和建设事业来展开服务 服从于党的中心任务	62
第三节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71
第四节 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立足于群众、 服务于群众	79
第五节 民主平等，注重疏导	87
第六节 坚持重在建设，着眼于团结稳定鼓劲	94
第七节 坚持党的领导，全党全社会共同来做	101
第三部分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in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新要求		109
第一节	深入把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	109
第二节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共同参与、 灵活有效运转的工作机制	119
第三节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思想 政治工作的任务更好地落到实处	125
第四节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大力营造良 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131
第五节	高度重视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推出更 多的优秀文艺作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 化活动	138
第六节	紧紧围绕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广 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145
第七节	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度，切实增 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实效性	152

附：十四大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重要文献

选编	158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5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 央宣传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17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 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 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18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	

重要问题的决议	194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 知	215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 决定》	226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的若干意见》	227
后记	233

第一部分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过程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大传统、一大优势，伴随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走过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过程。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也是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创立、大发展、继承创新、曲折和新的探索这样五个历史时期。

第一节 创立时期 (1917年—1937年)

在党的创立、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制度和理论基础基本确立。从一定意义上讲，党是靠思想政治工作起家的。

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早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社会的新的出路和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先后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接触工人群众，使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地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开始指导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恐慌，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也出面充当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于是出现了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大论战。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等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阵地。通过这些斗争，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重要的宣传工作经验。

二、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规定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并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思想宣传机构——中央局宣传部，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接着，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

《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推动建党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为此，“必须把工农劳动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这就实际地确定了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工农群众，宣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一大”组成中央局，下设宣传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为主任，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思想宣传机构。1924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设立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日常宣传工作。

三、1924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工农运动，并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教育，思想工作在北伐战争中初显威力。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大多数干部、党员加入了国民党。经过他们同进步的国民党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在农民群众中开展思想工作。1925年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韶山一带开办农民夜校，利用学习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年10月，毛泽东又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他利用这一条件，创办《政治周报》，在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他还主持了第六

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农民讲政治理论。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1927年初，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于同年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贯穿于文章中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

与此同时，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也开展了政治工作。黄埔军校与一切旧式军校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1924年11月，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对建立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6月，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上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工作的报告》，对于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意义、内容、方法等问题都作了简要说明。北伐军中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由于有党领导的政治工作，因而在北伐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

四、1927年三湾改编，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制度。随后又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斗争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1927年9月，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军队

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强调必须在党内和军内进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使之掌握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武装工农等各项知识，自觉地为工农阶级作战。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由于执行这三项任务，部队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发动了群众，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1928年春，毛泽东又总结几个月来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作用。

五、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的思想工作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个决议解决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之后，中央为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精

神，又制定系列具体条例。

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认识，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它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阐明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等，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把古田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各个部队，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1年2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毛泽东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陆续制定了《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连指导员工作须知》、《红军士兵会章程》等系列文件，使红军的政治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六、1934年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1934年2月，为了总结几年来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时刻，中央军委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首次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为了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周恩来还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业务工作相结合，政治工作要渗透到军事工作、业务工作中去的重要原则。他强调：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的胜利，部队政治工作的实施，要环绕在整个作战计划的周围，根据战斗任务的变化，政治工作必须机动、灵活、紧张和迅速。政治工作人员同样是红

色军人，必须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要会指挥打仗。

可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被排斥，使党和红军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治工作遭受挫折。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红军终于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胜利到达陕北。

七、1936年底到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论著，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当抗日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36年底到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论著，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清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回答党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

验的总结。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书中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

《矛盾论》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它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著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创立时期提出的口号有“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

第二节 大发展时期

(1937年—1949年)

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理论体系更加丰富，方式方法更加多样，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大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一、抗战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发表许多有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围绕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目标。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概括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在《论持久战》中，他精辟地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人与武器的关系，提出“民兵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不是物，因而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发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来支持战争。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明确提出了“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重要论断，透彻地阐述了军事与政治、加强政治工

作与改进政治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证关系。

刘少奇抓住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两个基本问题，用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开办党校，亲自讲课，为党和军队培养干部。1939年7月，刘少奇应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邀请，为该院学员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演讲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意义、内容标准、目的要求和途径方法等，大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很快就成为全体党员，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学习的教材。

此外，其他很多党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也作了不少有关政治工作的报告，写了不少有关政治工作的理论文章。如罗瑞卿著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张际春的《抗大政治工作及其经验》、傅钟的《八路军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等。我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重视政治工作经验总结与政治工作研究的气氛明显增强。

二、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确立，为系统总结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经验提供了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1939年10月，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为代表的一批重要理论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